

# “百日政权”建立原因探究

陈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摘要:**“百日政权”是拿破仑伟大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在短期内建立,原因很多。拿破仑的个性、心态及其爱国精神,拿破仑的政策、法规及其成就、影响,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等,都对百日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拿破仑;百日政权;建立原因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113-07

1815年3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奇迹般地  
从流放地厄尔巴岛(Elba)返回巴黎,再登帝位,重掌  
政权,直到6月22日第二次宣告退位,历时97天,  
史称“百日政权”(The Hundred Days)。“百日政权”  
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建立,这是中外“拿破仑史学”研  
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虽有学者对此做出了一些解  
释,认为拿破仑“百日政权”的建立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王朝复辟的反动性及  
复辟后倒行逆施,使拿破仑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拿  
破仑非凡的军事才干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及其威望”  
等等[1](12—16页)。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做  
进一步探讨。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  
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外因是  
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人又是历  
史活动的主体。因此,我们在探讨“百日政权”建立  
的原因时,既要强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  
影响,又要重视人的作用,还要考察当时特定的历史  
环境。

## 一 拿破仑的个性、心态及其爱国精神的作用

作为“百日政权”的建立者,拿破仑是这一历史  
活动的主角,他能够突然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并非

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有深层原因的。拿  
破仑的个性、心态及其爱国精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的内因或必然因素。

所谓个性(Individuality)是指“个人特征(倾向  
性)和他的社会角色的统一,它通过心理过程、心理  
特征、心理状况反映个人的社会特点,是兴趣、性格、  
能力、气质等心理要素的总和”[2](41页)。但是,  
人的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各种条件的变化  
而改变。拿破仑自然也不例外。少年时期的波拿巴  
沉默寡言,性情孤僻,不合群,且易激怒好斗。青年  
的波拿巴“性格阴沉,落落寡欢,而内心却热情奔  
放,善于思索”[3](17页)。人物的性格不仅体现于  
他做什么,而且体现于他怎么做。众所周知,拿破仑  
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但他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对人  
十分谦和宽容,这就使得他能够坚毅果断地办事,能  
够深得民心。

拿破仑在1805年去布里埃纳时,曾特意拜访了  
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对拿破仑  
高度赞扬,称:“他(指拿破仑)不但聪明、老成,有时  
有点忧伤的样子,而且对穷人一直很好。别看我是  
乡下人,我早就看出来,他日后一定会大有出息。”

收稿日期:2000-04-05

作者简介:陈涛(1979—),男,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4](185—187页)老妇人的言论虽不乏夸大、溢美的成份,但是却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拿破仑的恭敬、爱戴以及拿破仑本人的谦逊、随和。

拿破仑对士兵非常关心,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时常到部队里去检阅,和士兵们亲切交谈。在他的部队里,不仅有法国战士,还有不少慕名投奔到拿破仑麾下、为之效劳的外国斗士[5](58—59页)。

不仅如此,拿破仑还胸襟开阔。他明明知道富歇(Fouche)阴险狡诈、善搞阴谋,在“雾月政变”以后,仍留用了富歇。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但是拿破仑却认为富歇在警务方面有突出才能,既了解保王党人的活动,又熟悉雅各宾派(Jacobins)的情况,因而予以留用。他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我们应当记住好的方面,忘却坏的方面。”[6](210页)这些都为拿破仑建立“百日政权”打下了群众基础。

拿破仑本人权力欲极强。早在离开埃及之时,他“就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就是推翻督政府,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7](29页)。他曾说过:“权力是我的情妇,我象一位艺术家那样热爱权力。我爱它就象一位艺术家爱他的小提琴一样。”[8](415页)然而,莱比锡“民族之战”失败,拿破仑因失去昔日的大权而深受打击,心灰意冷,以致于企图自杀解脱。但在自杀未遂后,拿破仑萌发了寻找时机、东山再起、报仇雪耻的念头。于是,他怀着一线希望去了厄尔巴岛。在岛上,他密切关注时局,相机而动。“拿破仑是以对于那些条约的信任呆在厄尔巴岛的。他获悉在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提到要把他流放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人们并不遵守枫丹白露条约的条款来对待他,报纸把法国人民的心情告诉了他,他就打定了主意。可是他对于这一点,直到最后都严守秘密,在这个或那个借口下做好了准备”[9](498页)。

1815年2月,坚决拥护拿破仑返归执政的政治家马雷等人派夏布隆乔装成水手到厄尔巴岛谒见拿破仑,并向他汇报了国内的情况。他告诉拿破仑重返祖国的时机已到,全国上下都会拥护他的统治,并请拿破仑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这大大增强了拿破仑的信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回国。行动前夕,拿破仑对他母亲说:“我不能死在这个小岛上,也不能把自己的事业结束在安宁中,这是我所不应受的。军队在期待我。一切都促使我产生这样的希望:军队

一看见我,就赶快投奔到我这里来。当然,我会碰见忠于波旁王朝的军官,他们会制止军队的发动,那时我在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死去。这种结果比住在这个小岛上好得多。”[10](345页)拿破仑在儒安港登陆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把在厄尔巴岛(准备)的文告印出来;不过,他也曾担心印出来会泄露他的秘密”[9](503页)。这些都表明,拿破仑不甘心失去权力,不愿屈辱地活下去,他的行动不是轻率、鲁莽的,而是早有准备的。

除此以外,拿破仑还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结、民族意识。早在巴黎军校学习期间,在社会思想方面,拿破仑就深受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思想的熏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人民主权和革命权利思想,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同时,拿破仑在青年时代就悉心研究过法国的历史文明和民族传统,那时的他就痛恨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的不平等,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结、民族意识。在外国干涉法国革命、侵犯法国主权时,他提出“举起武器,保卫祖国,反对国内外敌人,宁死不屈”[9](695页)的口号,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精神。

拿破仑还曾多次表示:“我是属于国家的”,“除了祖国以外,我没有挂心的事”[9](12页),“不管作为第一执政或作为皇帝,我一直是人民的君主;我一直为民族及其利益进行统治……为了法国的利益,我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甚至我的生命”[9](491页),“它(指法兰西)的幸福是我唯一的希望,也始终是我的心愿”[3](230页)。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坚信“民族自尊心必将获胜”[11](414页)。拿破仑“象珍爱自己的光荣一样深深地珍爱法国的光荣”[9](598页)。波旁王朝复辟后推行反动政策,加上反法联军进驻法国,法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拿破仑又怎能坐视不理,不采取行动呢?

正因为拿破仑有勇有谋、顽强果断,善于深谋远虑、周全计划,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因而在权力欲和不服输心理的支配下,靠着坚强的意志、非凡的勇气、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情结、民族意识,使他能够赢得民心,并成功地重返首都,再掌政权。

二 拿破仑的政策、法规及其成就、影响的作用  
拿破仑统治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颁布了

《法典》，使法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使拿破仑在民众中有了颇好的形象和巨大的影响，从而使他在“百日政权”建立时得到人民的支持。

法国议院于1804年通过《法国民法典》，主要目的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关于这方面的规定，约占条文的三分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认在革命时期购得的财产一律归新占有者所有”[12](399页)。《法典》的颁布，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和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直到大革命时，法国依然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土地对农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农民对地产的热爱今昔一致，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当时一位出色的观察者说道：“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售出，原因在于所有居民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给个人或投入公租房，都是为了购置土地。”[13](66页)然而，农民又“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4](693页)。《法典》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度，因而对农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拿破仑推翻了督政府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Code Civil[民法典]中加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多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15](561页)由于《法典》充分肯定了农民对贵族和教会土地所有权的剥夺，保证了农民有权自由地利用他们所分得的小块土地，满足了农民强烈的土地私有欲望，因而，“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已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14](429页)。从这个角度说，拿破仑统治是大革命的继续。正如他的敌人所不断指出的，“他是大革命的卫士”[16](577页)。

《法国民法典》和随后颁布的几部《法典》，对维护私有财产，提倡自由贸易，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都起着积极作用。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

发展，生铁产量从1790年的4万吨增至1814年的11万吨，煤产量从1789年的70万吨增至1807年的500万吨，粮食产量从1790年至1812年增加了10%，法国对内对外贸易总额从1799年至1804年增加了35%，即从55300万法郎增至82100万法郎。在工业中出现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近代工厂，1805年发明了提花机，蒸汽机也得到了推广使用。在棉纺织业中，1790年法国只有“珍妮机”900架，1805年增加到1.25万架；1811年机器纺纱厂已达200多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口也有所增长，从1801年的2750万人增至1814年的2934万人。拿破仑曾骄傲地说：“我的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回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法典。”[9](715页)

不仅拿破仑的法典永传后世，而且他的宗教政策也深得民心。宗教问题在法国历史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战争、宗教纠纷、宗教矛盾一直不利于法国国内的稳定。法国大革命以前，天主教是国教，但新教、犹太教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大革命爆发后，1793年10月，国民公会(Convention)通过了“反基督教法案”，由此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化运动”(Dechristianisation)。虽然这场运动有不可否认的革命进步性，但是也极大地破坏了人们的宗教信仰，造成了社会的恐慌、混乱。为了维系人心，“人民需要有一种宗教”，只不过“这个宗教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8](202页)。

拿破仑上台后，特别重视同天主教会的关系，这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但是，必须迫使法国教士放弃他们在旧秩序下享有的特权，承认国家世俗化所取得的不可抗拒的进步。拿破仑深感利用宗教来维护道德和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他说：“宗教对于政府是有用的，应当利用宗教来感化人民”[12](398页)；“我从宗教那里看到的不是化身的奥妙，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奥秘”；“没有宗教的社会就象一艘没有指南针的船”[6](211页)。为此，他与教皇签定了“政教协定”(Concordats)，规定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所信奉的宗教”，但又不是国教。这既以法律的形式维护了法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又使天主教从属于国家政权。同时，拿破仑还与新教组织签订协议，承认新教与天主教拥有同

样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牧师的薪给也由政府支付。法国政府还颁布了保护犹太教的法律,宣布犹太教与天主教、新教享有平等的地位,犹太教祭司同样受到政府的照顾。他的宗教政策不仅有力地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促进了人民的和睦相处,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而且在国际上缓和了天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拿破仑具有雄才大略,他推行的政策、法规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数十年后,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还能够借助他的威名登上总统宝座,“他(指路易·波拿巴)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15](708页)。走马上任之后,路易·波拿巴又借助他伯父的大名在制宪会议上发表演说,发表他的施政纲领,“拿破仑,仅仅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套纲领。对内是秩序、权威、宗教和人民福利,对外是民族尊严”[17](232页)。在路易·波拿巴竞选过程中,农民还喊出了“有拿破仑名字的就投票”的口号。可见,历经数十载,拿破仑的影响力仍不减当年。非但如此,拿破仑在国外也是尽人皆知的。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8](636页)。意大利也从不敌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只给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这件事来说,就得感谢拿破仑”[18](640页)。甚至,拿破仑对许多作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作家斯汤达(Stendhal)评论拿破仑为:“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的一生。”[19](130页)他的名著《红与黑》体现了深刻的时代意义,反映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是充满革命的英雄主义“红”的年代,而复辟时期则是反动势力猖獗、到处充满了“黑暗”的年代[20](404—405页)。德国作家歌德(Goethe)对拿破仑也推崇备至[21](17—18页)。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复辟的波旁王朝不顾法国人民不想恢复旧制度的愿望而倒行逆施,以致于民怨沸腾时,人们自然期望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重新执政,给他们带来幸福。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为什么人们从复辟时期起就那样怀念不久前

被他们禁锢在地中海孤岛上的拿破仑呢?因为智者的专制要比愚者的专制好受些。”[22](177页)所以,当1815年拿破仑率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在法国登陆时,成千上万的农民欢呼着、簇拥着他,一直把他送到巴黎;拿破仑所到之处,士兵们(大多是农民)高呼“皇帝万岁”的口号,整队地投向了。他。

### 三 复辟王朝倒行逆施与特定历史环境的促成

复辟王朝推行的反动政策加速了拿破仑“百日政权”的建立。1814年4月6日,拿破仑宣告退位,元老院召路易十八归国即位。1814年7月,即路易十八复辟以后,王党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就曾写道:“如果认为法国国王重新登上了他祖先的宝座,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宝座。”[23](242页)因为大革命已把封建的法国变为资本主义的法国,只是在政治形式上留下了一个“宝座”。可惜,在大革命的25年中,波旁王朝“什么也没忘掉”。虽然路易十八在归国途中,曾在圣多昂发表了宣言,许诺要尊重民主宪政。他即位为国王后,也颁布了宪章,确立君主立宪制度,答应尊重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但是,宪章赋予国王极大的权力。它规定:国王有权任命国家机关和陆海军的一切高级官员;掌握外交大权;召集和解散两院;有权在议院休会期间不经议会同意颁布敕令等。国王任命王室成员、大地主、高级僧侣、将军和元帅为上院议员,可以终身任职或世袭。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但须年满30岁,至少纳300法郎直接税的人始得为选举人。因此,选举人只限于少数地主和缴纳营业税的商人和实业家,他们的人数不超过8.7万人。全国大多数人民都被排斥于国家大事之外[24](441页)。因为大臣不对两院负责,而国王又拥有立法动议权和否决议院法案的权力,所以两院的权力极为有限。起初,“大资产阶级相当满意地接受了这个宪章,因为一方面它阻挡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普通人民的一切政治影响”[25](351页)。但是,路易十八是不会把政府交给他们的。路易十八无意按照议会多数的愿望选用大臣,只是把旧制度下的“高级国务会议”和“争议处理会议”加以改头换面,大臣也不过是同他个别联系的高级雇员,他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见一致、集体负责的内阁。于是,资产阶级深感失望,也希望拿破仑归来。

波旁王朝在普通民众眼里,早就一文不值,倘若复辟政权“不恢复种种特权,也不再征收什一税和

各种封建租税”[25](351页),或许民众暂且会对它听之任之。然而,路易十八政府却不顾现实地恢复封建旧制度,恢复旧贵族的头衔,夺走农民的土地归还给旧贵族和教会,并增加赋税和什一税,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镇压资产阶级民主派。短期内,路易十八就把1万多名军官免职,把无能的贵族安置在宫廷、王室近卫军、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充任高官显职,领取丰厚薪俸,并恢复了1751年的法令,规定高级军职只能授予贵族;取消了圣西尔、圣日耳曼和拉弗莱什军校,代之以巴黎军校。此外,国王又把天主教定为国教,免除了教会学校的一切租税,还使教会不受政府的任何管制,继续向人民课征“综合消费税”(Droits reunis);并为基贝隆半岛登陆死亡的王党分子树立纪念碑,追封卡杜达尔(Cadoul)为贵族。尤为甚者,军队遭受了灾难性变革:“它被路易十八任命的元帅杜邦(Dupont)削减了一半兵员,因而,它便拥有一大批多余军官,人们仅发给他们一半军饷”[26](332页),以致于有2万多名军官生活降低甚至穷困潦倒。士兵们也处境悲惨,深受不幸。在拿破仑时代,“人们在村庄里度过的那些岁月,他们都能有面包和酒”[27](68页)。加上,经过20余年的革命洗礼,“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公会就曾逐渐把博爱与共和国,博爱与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法国人民毕竟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桎梏,取得了一些民主权利。然而,复辟王朝置现实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旧制度,“人们顷刻间便又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28](314页)。

复辟王朝的确“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会”[12](434页)。它一意孤行,推行反动政策,结果把人民和军队推向了拿破仑一边,加速了拿破仑百日政权的建立。难怪拿破仑曾说:“人民和军队把我送到巴黎!”“在各个方面我都应感谢人民和军队。”[3](238—239页)

不仅如此,复辟王朝的种种做法还伤害了法兰西人民的民族情感。“作为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倾向性、情绪性,常常表现为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生存”[29](45页)。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793年,反法联军侵犯法国,法国青年参加了战斗;已婚的人锻造武

器,提供给养;妇女们为士兵制作衣服,去医院照料伤员;孩子们用旧亚麻布制作绷带用的软麻布;老人们到广场上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

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所有法国公民都讲法语,即用“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各地方言;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出版了不少报纸、小册子和期刊,这些浅显、通俗的读物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还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以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仪式和象征。三色旗被看作是革命的象征。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以白旗代替了三色旗,白旗被看作是从前国王的旗帜”[24](427页),这就极大地刺伤了佩戴三色徽的法兰西人民的民族情感,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厌弃了波旁王朝的“白旗”及“百合花”徽标。

“稳定的疆土往往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民族正当利益的地理表现。一旦企图夺取界外的他国领土,便是侵略扩张的开端”[30](522页)。“第一次巴黎和约”规定法国退回到1792年1月前的疆界,却并没有让法国赔款、交还掠夺各国的艺术品。这个条约使法国受到损失,却并不十分苛刻,法国人尚能接受,而这只不过是同盟各国的权宜之计。当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后,同盟各国与法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力图消除大革命积极影响,削弱和限制法国。法国北部领土被外国军队占领,“自然疆界”也遭到破坏,殖民地被同盟各国瓜分,军舰和大炮也被收缴。外国军队直接地进驻法国,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如“奥地利军队曾在里昂地区大肆掠夺。1814年3月18日,当地一户殷实人家被掠走牛、羊、鸡、车辆、车轭、斧头、家俱、衣服、被褥等1095件(头、只),肥肉400公斤,奶油与油脂约44公斤,干草1万公斤,葡萄酒5850升等等”[30](524页)。但是,波旁王朝为了取得政权,不惜向同盟各国摇尾乞怜,奴颜媚骨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自然要招致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生存的法兰西人民的强烈反对。

复辟王朝在国内的倒行逆施帮了拿破仑一个大忙,而国际形势骤然间的微妙变化也为拿破仑提供了契机。拿破仑政权跨台后,获胜的同盟各国因在维也纳会议中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昔日强大的“反法联盟”出现了分裂。在维也纳会议上,战胜拿破仑的欧洲四大强国——俄国、英国、普鲁士和奥地

利,为各自攫取更多的利益而明争暗斗、争论不休,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俄国想占领整个波兰,它要求将原拿破仑控制下的华沙大公国和俄属波兰合并建立一个由俄国沙皇直接统治的王国。普鲁士支持俄国,但要求合并萨克森的全部领土以补偿它让给俄国原属它的波兰领土。英国和奥地利对此坚决反对。因为英国不愿俄国通过向西扩张变得更加强大,进而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奥地利也不愿把它侵占的波兰加里西亚、克拉科夫和维斯杜拉河一线的领土白白让给俄国,更不愿看到自己的近邻普鲁士吞并萨克森变得更加强大,进而威胁自己。于是,英奥秘密缔结了反俄普协定。由于双方相持不下,在维也纳会议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集团。

此外,在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上,同盟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正如俄国学者指出的:“在英国看来,拿破仑是英国所有的敌人中最不能和解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一千五百年历史中仅遇的敌人。只要一有他在,法国与英国之间就不能有比较长期的和平。在亚历山大看来,拿破仑是一个侮辱过他的人,但是除此以外,他又是唯一能够在最近适当的时期复兴波兰的君主。……普鲁士国王在更大(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持着这同一个理由。可以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被一种力量强迫在1813年3月对拿破仑作战的,威廉三世从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起,直到莱比锡的战斗止,一直被吓得目瞪口呆。……梅特涅根本不希望俄国在西方没有一个应有的对抗力量。他希望在欧洲仍然能有拿破仑,他对奥地利已经不可怕了,但是对于俄国却很不愉快,因为他可能成为奥国的盟国。”[10](312页)

这样,同盟各国之间为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并在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上意见不一,客观上为拿破仑重掌政权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而“反对执行拿破仑退位时同他缔结条约的那些人犯了大错的罪行,因为他们给了他离开厄尔巴岛最充足的借口”[31]

(504页)。

除此之外,时代造就的特殊机遇也为拿破仑的成功提供了客观条件。厄尔巴岛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位于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东北,邻近意大利,面积约为230平方公里。这个小岛上的人早就闻听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并十分崇敬他。同盟各国囚禁拿破仑于厄尔巴岛,为拿破仑逃跑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跟随拿破仑到达这个小岛的还有1100名士兵,他们负责在岛上保护拿破仑,这也有利于拿破仑经营厄尔巴岛,使之成为反攻基地。

按理说,拿破仑是不容易逃跑的,因为同盟国做了一些防范,在环岛海域有英法舰船的巡逻、监视,并且有一名英国军官专门负责在岛上监视拿破仑的行动。尽管有障碍,拿破仑还是暗地里为逃跑做好了准备,港湾里早已准备好了7艘船只,并且漆成了英国式样的“无常号”双桅船。行动前夕,负责监视拿破仑的英国军官贝尔正好前往托斯坎纳度假去了,这无异于解除了对拿破仑的监视。拿破仑瞅准这一天赐良机,下令士兵们快速行动起来,三位将军——康布罗纳、德鲁奥及斯维杰尼耶和军队跟着拿破仑登上了船。尽管一路上充满了危险,但是他们躲过了监视、巡察,顺利地法国登陆。一个个偶然因素、外部条件、特殊机遇,都为拿破仑成功地重返政坛提供了条件。

1815年3月,拿破仑重新执掌了法国政权。他之所以能够奇迹般地轻易地重返巴黎,绝非“主要是由于军事上的因素”[8](448页),其中有必然原因,也有偶然条件。正因为拿破仑权力欲很强,不甘心失败,有东山再起的强烈欲望,而复辟王朝又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加上时代造就的特殊机遇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拿破仑的重新上台。“百日政权”的建立,揭开了法国人民推翻复辟王朝,重建资产阶级政权的序幕。

#### 参考文献:

- [1]徐启诚.拿破仑建立百日政权的原因[J].上饶师专学报,1994,(2).
- [2]奚从清,沈赓方.社会学原理[M].宁波: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
- [3]李元明.拿破仑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4](法)G·勒诺特.法国历史轶闻:第二卷[M].王鹏,陈祚敏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 [5]张娅如.拿破仑和他的士兵[J].军事历史,1992,(4).
- [6]转引自:沈练之.法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7]转引自:刘仕超.拿破仑的思想性格与其帝国的兴亡[J].黄冈师专学报,1991,(4).
- [8]转引自:C·W·克劳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9]王养冲,陈崇武.拿破仑书信文件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10](苏)叶·维·塔尔列.拿破仑传[M].任田升,陈国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 [11](法)吉贝尔·马蒂诺.拿破仑的最后岁月——圣赫勒拿岛流放记[M].仓友衡,王正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 [12](苏)亚·德·柳勃林斯卡娅,等.法国史纲(从远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
-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6](法)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17]转引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9]转引自: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C].王养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 [20]王觉非.欧洲史论[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21]姚平芳.歌德与拿破仑[J].环球,1983,(11).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23]转引自:张之联.法国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24](法)瑟诺博斯.法国史[M].沈练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25](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M].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26](法)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近代下册[M].康新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27] *The Napoleonic Source Book*. New York, Philip J. Haythornthwait, 1990.
- [28]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宁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29]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30]郭华榕.法兰西历史限度论[A].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31](法)布里昂.拿破仑传[M].郁飞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Probe Into Causes of “the Hundred Days”

CHEN Tao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the Hundred Day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constituting Napoleon’s great life. Its establishment is affected by his individuality, psychology and patriotism, his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ir achievement and influence, the perverse acts of the restored court,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 Napoleon; the Hundred Days; cause of establishment

[责任编辑:凌兴珍]